



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2023 年 9 月 11 日至 10 月 6 日

议程项目 4

需要理事会注意的人权状况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问题国际独立实况调查团的报告*

概要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 2022 年 10 月 7 日第 51/29 号决议提交，载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问题国际独立实况调查团的调查结果。本报告重点关注两个主题：(a) 国家机器、镇压机制以及对公民和民主空间的限制；(b) 2022 年 7 月在玻利瓦尔国家警察局内设立战略和战术行动局，在结构、指挥和工作方式上延续其前身特别行动部队。

* 本报告逾期提交，以纳入最新信息。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3
A. 背景	3
B. 方法和证明标准	4
二. 近期动态	5
A. 政治和经济动态	5
B. 追究责任和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方面的进展	6
三. 镇压机制：主要侵权行为和罪行	7
A. 任意剥夺生命	7
B. 短期强迫失踪	8
C. 任意拘留	8
D.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9
E.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10
四. 其他镇压机制	11
A. 攻击、威胁、监视和骚扰	11
B. 诽谤和诋毁性言论	12
C. 刑事定罪	12
D. 取消政治资格	13
E. 审查和媒体限制	14
F. 对非政府组织、工会和政党成立和运作方面的限制	15
五. 战略和战术行动局	15
A. 前身：特别行动部队	15
B. 结构和指挥	16
C. 工作方式	17
六. 参与侵权和犯罪行为的机构	18
七. 结论和建议	18
A. 结论	18
B. 建议	20

一. 导言

A. 背景

1. 人权理事会在 2019 年 9 月 27 日第 42/25 号决议中，决定设立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问题国际独立实况调查团。调查团在 2020 年 9 月向理事会提交第一次报告，得出结论认为，有合理理由相信国家主管机关，包括政府最高层官员执行了一项政策，来压制、阻止和镇压反对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政府的人，包括通过实施危害人类罪行。¹
2. 人权理事会在 2020 年 10 月 6 日第 45/20 号决议中，将调查团的任务期限延长两年，至 2022 年 9 月。因此，调查团先后于 2021 年 9 月和 2022 年 9 月向理事会提交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报告。²
3. 人权理事会在 2022 年 10 月 7 日第 51/29 号决议中，将调查团的任务期限再延长两年，至 2024 年 9 月。本报告根据该决议提交，附带两份会议室文件。会议室文件反映了调查团的调查思路，载有调查团的详细调查结果。
4. 在第一份会议室文件³中，调查团讨论了委内瑞拉自 2020 年 1 月 1 日以来使用镇压机制镇压实际的或以为的政府反对派的问题。调查团首先重点关注其任务中明确列出的侵权行为和罪行(法外处决、强迫失踪、任意拘留、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包括涉及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侵权行为)，以期就调查团第一次报告中所载调查结果提供最新资料(见下文第三节)。调查团随后调查旨在限制公民和民主空间的其他镇压机制，包括攻击、威胁、监视和骚扰、诽谤和诋毁性言论、刑事定罪、取消政治资格、审查和媒体限制，以及对非政府组织、工会和政党成立和运作方面的限制(见下文第四节)。
5. 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第一份会议室文件中详述的镇压机制表明，该国继续使用“强硬”和“较温和”的策略(分别见下文第三节和第四节)，来对付那些调查、谴责或试图解决该国人权或社会经济问题的个人和组织，以及干涉或被认为干涉政府行为体利益，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犯罪利益的个人。在当前危机的不同阶段，国家根据所认为的社会反对力量的性质和强弱不同而采取不同形式的暴力和胁迫。受害者包括民间社会行为体，其中包括著名的人权和妇女权利维护者、记者、工会成员以及反对党领袖和成员。
6. 在第二份会议室文件⁴中，调查团讨论了 2022 年 7 月在玻利瓦尔国家警察局内新成立的战略和战术行动局的结构、指挥和工作方式，与特别行动部队的关系，以及这两个实体之间显而易见的延续关系(见下文第五节)。这一调查思路与

¹ A/HRC/45/33，第 160-166 段。

² A/HRC/48/69 和 A/HRC/51/43。

³ 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ffmv/A_HRC_54_CRP8_260923.pdf (只有西班牙文)。

⁴ 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ffmv/A_HRC_54_CRP9_EN_260923.pdf。

调查团之前关于参与侵犯人权和国际罪行的国家机构调查结果有关。⁵ 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国家主管机关非但没有通过真正的体制改革和问责制来取缔参与以往侵权和犯罪行为的机构，反而留任甚至提拔了一些对侵权和犯罪行为负有责任的个人。

7. 绝不应把本报告的重点理解为试图尽量淡化或忽视涉及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境内严重侵犯人权的其他案件，也不应解释为暗示没有发生过其他侵权行为和罪行。具体而言，调查团仍然感到关切的是，有大量关于安全部队在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安全行动中实施法外处决的指称。调查团注意到，尽管据报告称近年来安全部队杀人事件有所减少，但据称在该国被安全部队杀害的人仍然多得惊人，继续位居世界前列，反映出与调查团以往调查中记录的模式类似的模式。⁶

B. 方法和证明标准

8. 调查团根据既定方法、最佳做法和联合国承认的标准进行调查⁷，特别注意性别平等问题和侵权行为的性别影响。调查团根据独立、公正、客观、透明和廉正原则以及“不伤害”原则开展工作，包括在保证保密性以及保护受害者和证人方面。

9. 调查团使用“有合理理由相信”作为证明标准，这与人权理事会设立的其他调查机构的做法相一致。虽然这一标准低于刑事诉讼中的定罪标准(排除所有合理怀疑)，甚至低于确认刑事指控的标准，但足以证明有理由启动刑事调查。

10. 调查团在本周期内，共与 299 人(153 名男子、142 名妇女和 4 名不同性别认同的人)进行了 256 次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包括面对面访谈和通过保密电话、消息应用程序和视频通话进行远程访谈。调查团确保获得所有受访者的知情同意，可以在本报告中使用时提供的信息。调查团对可以或可能确定提供消息者、证人和受害者身份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或可能确定潜在肇事者身份的信息进行了适当的匿名处理。具体而言，119 个提供消息者和 5 名受害者的姓名被匿名。根据三名受害者的保护需要，将其转介给其他组织。

11. 人权理事会在第 42/25、第 45/20 和第 51/29 号决议中敦促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与调查团充分合作，允许调查团立即、充分和不受阻碍地进入该国全境，并向调查团提供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资料。调查团感到遗憾的是，政府继续拒绝与调查团接触。

⁵ 调查团在第一次报告中得出结论认为，有合理理由相信，特别行动部队参与实施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和国际罪行，作为旨在打击犯罪的安全行动的一部分。A/HRC/45/33，第 102-119 段；另见载有调查团详细调查结果的会议室文件(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FFMV/A_HRC_45_CRP.11.pdf)，第 2058-2060 段。

⁶ A/HRC/45/33，第 79-150 段。

⁷ A/HRC/45/33 号文件第 6 至第 11 段阐述了调查团使用的方法。

二. 近期动态

A. 政治和经济动态

12. 鉴于 2020 年 1 月 1 日以来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事态发展，调查团将调查重点转向民主和公民空间的逐步关闭。在早些时候，即 2014 年至 2020 年期间，如调查团第一次报告所述，该国的政治和体制危机以暴力和非法镇压民众示威活动为特点。国家镇压行动导致数十起安全部队任意剥夺生命的案件、任意逮捕实际的或以为的政府反对派，其中一些人被逮捕后遭受酷刑、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以及针对记者和媒体机构的广泛攻击。记录抗议活动次数最多的年份是 2017 年(9,787 次)，2018 年(12,715 次)和 2019 年(16,739 次)。⁸

13. 在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及抗议活动高峰期过后，没有再出现过类似规模的政治示威浪潮。与镇压抗议活动有关的国家暴力行为相应减少，但政府继续肆意排除异己，关闭公民和民主空间。

14. 调查团调查的镇压机制所处背景是持续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据非政府组织消息来源称，截至 2022 年 3 月，82.8% 的医院护理服务瘫痪，这意味着约 1910 万人无法获得医疗服务。⁹ 2023 年 4 月的年度通货膨胀率为 400%，¹⁰ 全球最高。截至 2023 年 8 月，至少有 771 万人离开该国。¹¹ 抗议活动性质的不断演变反映了这种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抗议活动越来越多地与经济和社会问题有关，如劳动条件、获得保健和基本服务的机会以及粮食和汽油短缺。¹²

15. 2022 年 3 月至 2023 年 3 月期间，在国际劳工组织的支持下，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会举行了四次社会对话论坛。¹³ 尽管取得了这一进展，但在 2022 年 7 月，国家预算办公室的工资改革引发了广泛抗议活动。¹⁴ 与此同时，工会领导人继续受到迫害。

⁸ Observatorio Venezolano de Conflictividad Social, “Informes anuales”, 23 February 2023. 可查阅 <https://www.observatoriodeconflictos.org.ve/informes-anuales/informes-anuales> (只有西班牙文)。

⁹ HumVenezuela, “Follow-up report on the impacts of the complex humanitarian emergency in Venezuela following the confinement due to the COVID pandemic: updated to March 2022, as compared to March 2020 and June 2021”, March 2022, p. 34. 可查阅 <https://humvenezuela.com/en/follow-up-reports>。

¹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家数据”,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可查阅 <https://www.imf.org/en/Countries/VEN#countrydata> (2023 年 9 月 1 日访问)。

¹¹ 委内瑞拉难民和移民问题机构间协调平台, “委内瑞拉难民和移民: 2023 年 8 月”, 2023 年 9 月 5 日。可查阅 <https://www.r4v.info/en/document/r4v-latin-america-and-caribbean-venezuelan-refugees-and-migrants-region-aug-2023>。

¹² 见 Observatorio Venezolano de Conflictividad Social, “Informes anuales”(只有西班牙文)。

¹³ 见 https://www.eeas.europa.eu/delegations/un-geneva/ilo-governing-body-follow-report-further-developments-concerning-social_en?s=62。

¹⁴ Programa Venezolano de Educación Acción en Derechos Humanos, “¿Qué es el Instructivo ONAPRE?, la impopular medida de Maduro que genera el rechazo de los trabajadores venezolanos”, 7 August 2022. 可查阅 <https://provea.org/actualidad/que-es-el-instructivo-onapre-la-impopular-medida-de-maduro-que-genera-el-rechazo-de-los-trabajadores-venezolanos> (西班牙文, 有英文译文)。

16. 与早期的国际孤立状态相比，2022年进入了重新开放和对话阶段。2022年8月，政府开始与他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¹⁵ 在这一年里，面临俄罗斯联邦入侵乌克兰导致的国际能源危机加剧，美利坚合众国批准与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经营的外国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进行一些交易。2022年11月26日，在墨西哥城，政府与委内瑞拉反对派政治联盟“统一平台”重启对话和谈判。双方同意利用被冻结的委内瑞拉资产设立一个30亿美元的社会保障基金，由联合国管理。

17. 2022年12月30日，反对派政党聚集在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2015-2021年)的继续会议上，投票决定解散2019年成立的以反对派领导人胡安·瓜伊多为首的临时政府。¹⁶ 瓜伊多先生随后逃离该国。

18. 工资冻结，通胀率居高不下，持续削弱了工作和退休人口的购买力。¹⁷ 2023年初，人民对国家经济状况的不满和抗议进入了新阶段，尤其涉及卫生和教育部门以及国有企业。

19. 随着2024年总统大选前的预选周期拉开帷幕，该国加紧了对公民和民主空间的限制。2023年6月，反对派政治人物和总统候选人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被取消15年内担任公职的资格。¹⁸ 2023年8月1日，六名曾在2022年劳工抗议活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工会和社会领袖，因阴谋罪和加入有组织犯罪团体罪被判处16年监禁。¹⁹ 2023年8月10日，委内瑞拉最高法院暂停了委内瑞拉共产党委员会。²⁰

20. 2023年8月24日，全国代表大会任命了2023至2030年国家选举委员会的新成员。当时的总审计长埃尔维斯·阿莫罗索被任命为国家选举委员会主席，由于他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令人担心该机构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能否保持独立。

B. 追究责任和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方面的进展

21. 自调查团第一次报告以来，在追究调查团调查的违法行为和罪行责任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2023年6月27日，国际刑事法院第一预审分庭授权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继续对“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局势一”进行调查。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在其授权请求中大量引用了调查团的调查结果。

¹⁵ Euronews, “Venezuela y Estados Unidos retoman el diálogo en el marco de la crisis energética mundial”, video, 8 March 2022. 可查阅 <https://es.euronews.com/2022/03/08/venezuela-y-estados-unidos-retoman-el-dialogo-en-el-marco-de-la-crisis-energetica-mundial> (只有西班牙文)。

¹⁶ National Assembly, “Aprobada 2da discusión Reforma de Ley de Estatuto que rige la Transición propuesta por AD, PJ, UNT y MVP que elimina el Gobierno interino y toda referencia a la usurpación”, 31 December 2022 (只有西班牙文)。

¹⁷ Florantonia Singer and Alonso Moleiro, “Maduro se enfrenta a un nuevo pico de protestas por los bajos sueldos en Venezuela”, *El País*, 16 January 2023 (只有西班牙文)。

¹⁸ National Assembly, “Diputado José Brito confirma inhabilitación política de María Corina Machado”, 30 June 2023 (只有西班牙文)。

¹⁹ 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 “委内瑞拉: 联合国专家谴责使用反恐法律对工会成员和劳工领袖定罪”, 2023年8月11日。

²⁰ 见 <http://historico.tsj.gob.ve/decisiones/scon/agosto/328317-1160-11823-2023-23-0708.html> (只有西班牙文)。

22. 2023 年 6 月 14 日，克鲁尼正义基金会就两名曾于 2014 年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参加抗议活动的人死亡事件向阿根廷联邦法院提交申诉。请求阿根廷法院依据普遍管辖原则，对危害人类罪展开调查，起诉书援引了调查团之前的报告。²¹

23. 美洲人权委员会和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多次援引调查团的结论。调查团的工作还有助于对寻求庇护者和其他被迫离开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人提供国际保护。

三. 镇压机制：主要侵权行为和罪行

24. 调查团调查了其任务中明确列出的针对实际的或以为的反对派的侵权行为和罪行(法外处决、强迫失踪、任意拘留、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包括涉及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侵权行为)。调查团在报告中重点关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期间的情况，以期就先前的调查提供最新资料。为编写这份最新资料，调查团调查了 43 起新案件，涉及 72 名受害者(47 名男性和 25 名妇女，包括一名跨性别妇女)。

25. 该国的政治和人权危机在 2020 年底至 2021 年初这段时间发生变化，最严重的时期是 2014 年和 2017 至 2019 年。2020 年，随着 COVID-19 疫情爆发，反对党号召的大规模示威活动结束，大规模逮捕示威者并在拘留期间实施酷刑的做法有所减少，针对推翻或破坏政府稳定的举措而采取的大规模反叛乱行动告终。²²

26. 至于 2021 年初之后的一段时间，调查团收到的关于针对实际的或以为的政府反对派实施任意剥夺生命、任意拘留、短期强迫失踪、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以及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指称有所减少。关于调查团之前记录的在打击犯罪的安全行动中实施的侵权行为，特别是法外处决，调查团无法断定这类侵权行为是更多还是更少，因为它们超出了当前调查的重点范围。

A. 任意剥夺生命

27. 调查团调查了自 2020 年以来的九起死亡案件，这些案件可能符合针对实际的或以为的反对派的镇压模式。其中包括三起与抗议活动有关的死亡、四起民间社会行为体死亡和两起拘留期间死亡。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在其中至少五起案件中，死亡事件构成国家主管机关任意剥夺生命。

28. 这三起与抗议活动有关的死亡事件是在安全部队镇压 2020 年 7 月和 8 月蔓延全国的抗议燃油短缺活动期间发生的。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和军事反情报总局对 Carlos Ernesto Chaparro 在阿拉瓜州遇害和 Junior Enrique Chaparro 在安索阿特吉州遇害负有责任。关于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国际议定书没有得到遵守。卡里纳土著人 Junior Enrique Chaparro 的尸体被发现埋在森林里，身上有七处枪伤。

²¹ Nicolás Misculin, “Clooney Foundation denounces Venezuelan security forces for alleged human rights abuses”, Reuters, 15 June 2023.

²² A/HRC/51/43, 第 26 段。

29. 调查团调查了四起民间社会行为体遭受暴力致死的事件：著名的土著部落乌沃图亚领袖 Trujillo Trujillo Arana 于 2022 年 6 月在亚马逊州遇害；共产党活动人士和社会传播者 José Gregorio Urbina 于 2022 年 1 月在阿普雷州遇害；以及记者 José Carmelo Bislick Acosta 和 Andrés Eloy Nieves Zacarías 于 2020 年 8 月分别在苏克雷州和苏利亚州遇害。调查团无法认定这些案件属于有针对性地镇压实际的或以为的反对派的范畴。需要进一步的调查，调查内容除其他外必须包括这一假设。

30. 调查团调查了以下两起拘留期间死亡事件：Raúl Isaías Baduel 将军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在“螺旋大厦”拘留中心被玻利瓦尔国家情报局拘留期间死亡²³；佩蒙土著人民组织成员 Salvador Franco 于 2021 年 1 月 3 日在埃尔罗德奥第二监狱死亡。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这两起死亡事件都是由于没有获得足够医疗照顾而直接造成的。根据国际标准，除非另有证明，否则拘留期间死亡被视为任意剥夺生命，并产生国家责任。²⁴

B. 短期强迫失踪

31. 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自 2020 年以来，在 14 起案件中(涉及 10 名男子和 4 名妇女)，个人遭受国家主管机关实施的短期强迫失踪。受害者失踪至少几个小时，有的长达 10 天，下落才被发现。尽管受害者的亲属和(或)律师要求知道受害者是否被关押在特定拘留地点，但掌握这一信息的主管机关没有作出任何答复。

32. 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在一些案件中，检察院故意拖延正式拘留日期，在另一些案件中，拒绝向亲属提供关于在拘留中心之间转移个人的信息。调查团还记录了将被拘留者送进正式拘留中心之前将其带到秘密场所的非法做法，例如 John Jairo Gasparini Ferbans 的案件，他因与“宪法行动”有关而被拘留。

C. 任意拘留

33. 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自 2020 年以来，至少有 58 起案件中的个人被任意拘留。在这些案件中，有 53 起是在有选择地镇压实际的或以为的政府反对派期间发生的，五起是在抗议活动期间发生的。大多数逮捕是军事反情报总局或玻利瓦尔国家情报局所为。

34. 调查团调查的这 53 起有选择镇压期间发生的案件中，涉及任意拘留工会领导人、人权维护者、非政府组织成员、记者、反对党成员、教师和其他对政府提出批评或投诉，包括提出劳工诉求的人。其中两起案件共涉及 11 人，逮捕的理由是据称参与军事叛乱行为，官方称之为意图颠覆政府。有三起是针对军事人员的案件。

35. 调查团还发现，这些案件中主要嫌疑人的亲属遭到任意拘留，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拘留是合理的。这种做法对妇女的影响尤其严重，因为主管机构拘留

²³ 调查团之前曾调查过这起案件：见人权高专办，《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问题国际独立实况调查团关于 Baduel 将军在拘留期间死亡事件的声明》，2021 年 10 月 18 日。

²⁴ 例如，见人权事务委员会，Zhumabaeva 诉吉尔吉斯斯坦案(CCPR/C/102/D/1756/2008 和 CCPR/C/102/D/1756/2008/Corr.1)。

了追捕对象的女性亲属和伴侣，以便对主要嫌疑人施加压力和进行恐吓。这些妇女最终因叛国和恐怖主义等严重罪名而卷入法律诉讼，比如在“吉迪恩行动”和“宪法行动”等案件中。因此，这些妇女的人权遭受严重侵犯，有时甚至比据称犯罪者所面临的情况更加严重。

36. 调查团确定了三种常见的任意拘留模式。首先，在几起案件中，被拘留者是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被逮捕的。调查团的调查显示，主管机关往往不出示逮捕证，也不告知被拘留者逮捕理由。作案现场逮捕往往缺乏正当理由，或通过用伪造的证据栽赃被拘留者，特别是火器，作为逮捕理由。安全部队闯入被拘留者的家中，没有出示搜查令，过度使用武力，并威胁被捕者的亲属。被拘留者很少在法律规定的 48 小时内被带见法官，有些人在被捕后等待长达 10 天才被带见法官，检察院通过虚报逮捕日期来掩盖这一点。

37. 调查团确定的第二种任意拘留模式是监禁时间超过法律允许的期限。调查团发现，在玻利瓦尔国家情报局和军事反情报总局总部以及全国其他拘留场所，预防性审前拘留都超过了允许的最长期限。

38. 调查团确定的第三种任意拘留模式是即使法官下令立即释放被拘留者，有些人仍被关在监狱里，监狱长以等待人民政权监狱管理部批准为由拒绝释放。²⁵ 这种模式对因反对政府而被剥夺自由的人影响尤其大，调查团记录的至少 15 起案件说明了这一点。

D.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39. 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它调查过的一些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案件，可追溯到 2020 年至 2021 年初，反映了压制、阻止和镇压政府反对派的国家政策，正如之前报告所记录的那样。调查团调查了在正式和秘密拘留场所发生的 28 起案件(涉及 22 名男子和 6 名妇女，包括一名跨性别妇女)。调查团收到的资料表明，遭受酷刑或虐待的受害者往往选择沉默，因为他们担心遭到报复或继续拘留带来的不良后果。

40. 调查团记录的行为包括：殴打，特别是殴打头部、肋骨、臀部、生殖器、腿部、手指和脚趾；拴住手腕或脚踝悬吊；用袋子套头窒息，有时往上喷洒杀虫剂；低温暴露和冷水浴；烟头灼伤；催泪瓦斯；剥夺睡眠，包括一天 24 小时持续的光照和嘈杂的音乐；关进只有站立空间的惩罚牢房；以及长期单独监禁。调查团收到了关于使用心理折磨的资料，包括威胁伤害被拘留者的伴侣和子女，威胁将被拘留者关在拘留条件更差的地方或延长拘留时间，或者威胁对他们实施酷刑或强奸。

41. 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某些酷刑和虐待行为是为了惩罚被拘留者从事与工会或人权有关的活动、谴责腐败行为、参与政治活动或以其他方式采取反对政府的行为或公开反对政府。在一些案件中，实施酷刑或虐待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捏造的供词或虚假陈述。

²⁵ Observatorio Venezolano de Prisiones, “En Venezuela le niegan la libertad a reclusos con boleta de excarcelación”, 27 June 2022 (只有西班牙文)。

42. 调查团的调查显示，国家主管机关没有对关于酷刑和虐待的指称采取行动。无论是司法机构、检察院还是监察员办公室，都没有认真行事，对指称作出回应。因此，在涉及实际的或以为的政府反对派的案件中，酷刑和虐待行为不受惩罚仍然是常态。

43. 调查团报告的事实与国家主管机关使用酷刑和虐待的做法相符，目的是在委内瑞拉民间社会中制造和维持恐惧气氛，并展示持不同政见者的下场。调查团采访的一些人说，酷刑和虐待案件的象征性影响起到了恐吓民间社会和压制不同意见的作用，特别是在“螺旋大厦”拘留中心和博莱塔拘留设施的“梦想之家”牢房中继续使用酷刑室。

44. 调查团继续收到报告称，在包括博莱塔拘留设施在内的军事反情报总局拘留中心、玻利瓦尔国家情报局的“螺旋大厦”拘留中心和国家女子惩教所，政府反对派或被认为是政府反对派的人所处拘留条件恶劣。恶劣的拘留条件包括卫生条件不足和缺乏卫生用品；没有新鲜空气和见不到阳光；牢房过度拥挤；剥夺获得药物和医疗的机会，包括获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的机会；以及食物和水不足，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相当于酷刑和其他虐待。此外，调查团还收到了关于任意限制家属和律师探视、侵犯哺乳母亲以及监狱外有年幼子女的被拘留妇女权利的资料。

E.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45. 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继续被用作对实际的或以为的政府反对派的一种酷刑和羞辱形式，通过强奸、威胁强奸、侵入性搜身和强迫裸体，使虐待和压迫的循环一直存在。

46. 调查团调查了自 2020 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涉及 19 名在拘留场所遭受性暴力或性别暴力的受害者，包括实际的或以为的反对者及其亲属和律师(4 名男子和 15 名妇女，包括一名跨性别妇女)。这些案件包括威胁强奸两名妇女和对三名男子进行强奸。这些受害者都是在大规模反叛乱行动的最后一年，也就是 2020 年被捕的。

47. 调查团记录了逮捕个人不久后就将性暴力用作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案件。在至少五起案件中，特别行动部队和军事反情报总局的官员实施了性暴力行为或威胁强奸被拘留者(包括告诉女性被拘留者她们将被裸体送到一间有男性官员的房间)。两名被拘留的女军官被人用钝器强奸。

48. 在委内瑞拉监狱系统中，作为侵入性搜身的一部分，强迫裸体很普遍，对妇女的影响尤其严重。调查团从六名受害者和四名直接证人(均为妇女)那里得到信息，称在侵入性搜身中系统地使用强迫裸体。调查团收到的资料表明，这些行为特别恶意针对被拘留的实际的或以为的政治反对派及其法律代表和亲属。

49. 调查团记录了对被拘留的实际的或以为的政府反对派使用性别侮辱或威胁，作为一种羞辱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例如，被监禁的妇女受到侮辱，被贴上“坏母亲”、“婊子”或“妓女”的标签。往往利用子女以及不合作的后果对妇女进行威胁，相比之下，对男子的这种威胁要少得多。

四. 其他镇压机制

50. 调查团在 2020 年的第一次报告中得出结论认为,在委内瑞拉针对实际的或以为的政府反对派的国家政策中,包括有针对性地镇压民间社会行为体和政治领导人。这种镇压包括人身攻击、威胁、诽谤和污名化、行政报复(特别是罢免从政者、法官或政府官员的职务)、任意进行刑事起诉以及骚扰和威胁实际的或以为的政府反对派的亲属。

51. 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自 2020 年以来,继续以更有选择性的方式实施针对实际的或以为的政府反对派的政策,重点针对能够起到榜样作用的个人,以阻止其他人表达不同意见。这一政策既涉及上一节提到的主要侵犯人权行为,也涉及调查团记录的其他镇压机制,即攻击、威胁、监视和骚扰;诽谤和诋毁性言论;刑事定罪;取消政治资格;审查和媒体限制;以及对非政府组织、工会和政党成立和运作方面的限制。

52. 调查团调查了 62 起案件,在这些案件中,国家对 51 名直接受害者(30 名男子、19 名妇女和 2 名不同性别认同的人)使用了上述镇压机制。它还调查了 42 起攻击政党和民间社会组织(包括人权非政府组织、工会和媒体)并限制其运作的案件。

53. 这些镇压机制严重侵犯了表达自由权、结社与和平集会权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导致公民和民主空间缩小。这种侵权行为不仅影响到直接受害者,而且对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在获取信息、保护人权和多元化方面,导致公民和民主空间缩小。

A. 攻击、威胁、监视和骚扰

54. 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人权维护者、工会成员、记者和从政者的正常活动受到系统性镇压,有的是通过直接干预,有的是通过恐吓和监视。调查团记录了这些行为体在参加合法活动,如公共活动或内部会议时,或在前往国内不同地区参加这些活动时受到监视和恐吓的各种案件。身着制服的安全部队人员和身着便服的个人乘坐国家车辆和无标志警车,对这些人进行跟踪和拍照,有时还在街上和他们的家中对他们进行威胁和骚扰。

55. 调查团记录了 *colectivos*(公民武装安全团体)²⁶和其他支持政府的平民对反对党成员和记者进行威胁和人身攻击的案件,这些事件发生时安全部队在场,却没有进行干预,来阻止攻击或保护受害者。如果记者报道内容对政府不利,国家官员会进行威胁和骚扰,阻止记者报道公众关心的问题。

56. 非政府组织、人权维护者和其他谴责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受到国家安全部队和政府官员的威胁和恐吓,工作受到阻碍。调查团记录了自 2020 年以来针对不同组织成员的威胁和骚扰案件,如健康权利非政府组织 *Prepara Familia* 和妇女权利非政府组织 *100% Estrógeno*。2023 年 7 月,亚马逊州的土著领导人 *Nancy Herrera* 被迫就谴责一名将军涉嫌参与非法采矿活动而向他公开道歉。

²⁶ 如调查团之前报告所述, *colectivos* 是公民武装安全团体,大多与政府结盟(A/HRC/45/33, 第 128 段)。

B. 诽谤和诋毁性言论

57. 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政府正在开展一场联合运动，通过国家高级官员发布的诽谤和污名化信息，破坏实际的或以为的反对者的声誉，这些信息被亲政府网站和社交媒体转载和广泛传播。

58. 国家官员诽谤和诋毁性言论的矛头最常指向发表言论批评政府或其政策的个人、媒体和组织。此外还包括没有直接批评政府、但发布被认为会损害国家形象的信息的个人，例如报道社会抗议或委内瑞拉移民死亡事件的人。受某些外国捐助者资助的组织也经常成为目标，被贴上“叛徒”的标签，例如数字媒体机构 *Efecto Cocuyo* 和其他组织因为据称接受了支持独立媒体的外国政府基金捐款而在 2021 年被国家官员和武装部队公开指称密谋推翻政府。

59. 在政府的公共活动和全国代表大会电视转播会议期间，发表了针对实际的或以为的政府反对派的诽谤和诋毁性言论。全国代表大会议员兼执政党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副主席奥斯达多·卡韦略经常利用国家电视台制作和播出的节目 *Con El Mazo Dando* 诋毁实际的或以为的反对者，包括指控他们犯下严重罪行。这些言论威胁到被诋毁者的安全，因为它们引发了任意的刑事指控，激起了公众对独立媒体、人权维护者和非政府组织等的蔑视。

60. 调查团注意到，政治领域内的攻击和骚扰普遍存在性别不平等。调查团采访的委内瑞拉政界知名妇女，包括一名跨性别妇女，都谈到了针对敢于涉足公共领域的妇女普遍存在的政治暴力文化。性别攻击往往表现为贬低她们的外表、智力和能力。这种带有性别歧视的骚扰阻碍了妇女参政，还助长了一种敌对环境，导致许多妇女不敢谋求公职。

61. 据调查团采访的个人称，与政府或执政党有关系的社交媒体平台是传播基于性别的仇恨言论和说法的主要空间，目标是妇女以及具有不同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个人。调查团收到了几名妇女人权维护者的证词，特别是倡导性权利和生殖权利的妇女，她们担心这种骚扰可能升级为人身攻击或任意刑事指控。这种担心要么导致了不必要的自我审查，限制了他们的工作，要么甚至迫使他们不得不离开该国。

C. 刑事定罪

62. 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委内瑞拉的刑事司法系统被用来对实际的或以为的批评或反对政府的人，特别是记者、工会活动人士、人权维护者和政治活动人士进行刑事定罪。国家通过对这些人提出任意的、往往是严重的刑事指控，而且通常对他们实施违反正当程序的漫长审判过程，利用刑事司法制度压制和惩罚批评或反对政府的人。

63. 调查团已经查明了个人因从事合法活动而被任意指控的具体模式。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指控经常被用来惩罚行使结社和集会自由权的个人。例如，工会领导人 Eudis Girot 最初于 2020 年 11 月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阴谋”和“参加犯罪团体”等罪名，因为他在 Twitter 上发布了几条消息，据称是呼吁石油行业的工人团结起来应对燃料短缺。

64. 委内瑞拉关于禁止诽谤和诋毁的立法，包括措辞含糊的《反对仇恨、促进和平共处和容忍的宪制法案》，被用来将人权维护者和记者的工作定为刑事犯罪。例如，2021 年 7 月，非政府组织 FundaREDES 负责人 Javier Tarazona 因谴责武装团体与政府之间据称存在联系而被起诉“煽动仇恨”。调查团还记录了几起人权维护者和公职人员因谴责国家主管机关参与腐败行为而被定罪的案件，他们因“参加犯罪团体”和“泄露机密信息”等莫须有的罪名被定罪。

65. 在调查团调查的几起刑事定罪案件中，受害者面临严重违反正当程序的情况，特别是法院审理程序不当拖延，导致被告在两次审讯之间等待数月甚至数年，不让他们接触自己选择的律师，检察院拒绝提供案件档案副本，或者当检方无法在法律允许的时间内提出调查结论时将案件“存档”²⁷，而不是销案。同样，调查团还记录了就指控进行“非正式谈判”的案件，其中法官用不合理的严重恐怖主义指控威胁被告，迫使他们承认较轻的指控。

66. 一个典型案例是记者和反对党成员 Víctor Ugas 于 2019 年 12 月因“反抗主管机关”而被起诉。在审判的头 32 个月里，Ugas 先生被剥夺了聘请私人律师的权利，他从未获准查阅自己的案件档案。在编写本报告时，审判仍在进行。

67.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包括 Néstor Astudillo、Gabriel Blanco、Alcides Bracho、Reynaldo Cortés、Alonso Meléndez 和 Emilio Negrín 在内的六名工会成员于 2022 年 7 月在领导劳工抗议活动后被拘留。他们最初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参加犯罪团体”、“蓄意破坏”和“共谋”等罪行。他们最终于 2023 年 8 月被判犯有共谋罪和参加犯罪团体罪，定罪依据是反情报报告，这些报告得到了一名“合作”证人的证词支持，而该名证人从未亲自出庭作证。据调查团采访的提供消息者称，如果他们承认最严重的指控，恐怖主义特别法庭的法官就会给予他们较轻的判决。

68. 由于缺乏正当程序，导致该国出现了一种通常被称为“起诉即定罪”的现象，即仅仅被指控犯罪就会受到惩罚，事实上抛弃了无罪推定原则，并在几乎无法或完全无法诉诸法律的情况下长期实施限制性预防措施。

69. 通过将参与合法公民活动的行为定为犯罪，政府不仅使那些直接受到指控的人禁声，而且让人们感受到被定罪的风险，对考虑参与任何可能被视为批评政府活动的人造成了寒蝉效应。

D. 取消政治资格

70. 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主管机关利用取消政治资格来阻止反对派成员竞选公职。根据 2010 年修订的《设立总审计长办公室和国家财政管理系统法》第 105 条，总审计长拥有禁止个人 15 年内竞选公职的专属权力。²⁸

71. 总审计长没有公布关于取消政治资格的决定，尽管根据上述法律，这些决定必须在政府公报上公示，并通知有关各方。在调查团调查的几起案件中，当事人直到几年后才知道自己被取消了政治资格。

²⁷ 已存档的案件可由法官酌情重新审理。见《刑事诉讼法》，第 297 和第 364 条。

²⁸ *Official Gazette*, No. 6,013 Extraordinary, 23 December 2010.

72. 调查团注意到，禁止公职人员，包括著名的反对派领导人竞选公职的做法在选举进程开始之前的几个月里更为频繁。在编写本报告时，参加初选的反对党“统一平台”三名候选人 Henrique Capriles、María Corina Machado 和 Freddy Superlano 已被禁止参加定于 2024 年举行的总统选举。

E. 审查和媒体限制

73. 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政府一再审查和限制合法的媒体活动。2012 年至 2013 年期间，政府建立了一个法律框架，以控制平面媒体获得必要资源的机会，并限制政府认为具有批判性的任何媒体获得这些资源的机会，导致独立平面媒体逐渐消失。到 2021 年，该国大多数报社已经放弃纸媒，有的已经关闭，有的转型为数字平台。

74. 2000 年成立了国家电信委员会²⁹，2004 年通过并于 2010 年修正了《广播电视社会责任法》³⁰，从而将国家对电信媒体的控制纳入法律。国家电信委员会主要通过电话向广播电台和电视频道发布命令，禁止在广播中使用某些主题或词语，或禁止采访某些个人。国家电信委员会禁止公开讨论国家官员或其亲属涉嫌腐败或违法行为的问题；禁止提及国际法院和人权机制，如国际刑事法院或本调查团(除非是为了诋毁这些机构)；以及禁止报道反对政府的社会抗议或示威活动。

75. 国家电信委员会审查了包括“独裁”、“政权”、“临时政府”和“政治犯”在内的词语。国家电信委员会禁止采访反对党候选人，也禁止采访一些活动人士、人权维护者和记者。国家电信委员会不仅限制播放内容，而且还拒绝发放许可证，没收设备，并关闭不遵守其指令的电台和电视台。例如，在线电视新闻频道 VPItv 于 2021 年 1 月 8 日关闭了加拉加斯办事处，自该日起被禁止在该国运营，因为它发布了有关社会抗议活动的信息，并在一份出版物中将胡安·瓜伊多称为“临时总统”。根据《广播电视社会责任法》，该频道因发布可能煽动仇恨和出于政治原因的不容忍以及扰乱公共秩序的信息而受到制裁。

76. 尽管记者和广播公司为避免遭到报复而越来越多地进行自我审查，但在 2003 年至 2022 年期间，国家电信委员会关闭了全国近 300 家广播电台，2022 年是关闭数量最多的一年。在许多情况下，广播电台是通过非正式电话或在没有出示所需文件的情况下被关闭的，没有任何法律途径对决定提出上诉。

77. 在大多数广播电台被关闭的事件中，主管机关声称广播公司没有经营所需的许可证。应当指出的是，申请广播电台许可证的程序一再受到批评，因为程序繁琐、费用高得令人却步，而且不清晰，许多电台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经营了好多年，只是在播出了被认为是批评政府的信息之后才受到制裁。

78. 随着平面媒体消失，传统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被审查和关闭，互联网成为该国为数不多可以分享未经审查的独立来源信息的空间之一。然而，只有一小部分人

²⁹ 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ficial Gazette*, No. 36,970, 12 June 2000.

³⁰ *Official Gazette*, No. 38,081, 7 December 2004; *Official Gazette*, No. 38,333, 12 December 2005; and *Official Gazette*, No. 39,579, 22 December 2010.

口能够上网，国家电信委员会已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封锁那些发布被认为是批评政府信息的网页。

F. 对非政府组织、工会和政党成立和运作方面的限制

79. 评估团有合理理由相信，政府正在利用现有的监管框架限制非政府组织、工会和政党的活动。最近通过的条例往往与打击恐怖主义或反洗钱等合法目标有关，被用来限制民间社会组织的活动。关于非政府组织和国际合作的法律草案目前已提交立法机构，一经通过，将设置新的法律和运营障碍，包括在获得资金这一关键领域设置障碍。³¹

80. 人权团体和其他民间社会组织在尝试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向有关主管机关登记时，遭到拖延甚至拒绝。这些障碍限制了它们正常运作的能力，甚至限制了它们依法成立的能力。

81. 委内瑞拉法院在工会、工会联合会、专业协会甚至政党中都设立了特设理事会。自 2020 年以来，司法部门对政党事务的干预，包括对民主行动党、人民意愿党、正义第一党和共产党等主要政党的干预一直在逐渐增多，考虑到 2024 年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这种现象尤其值得关注。

82. 本节分析的政治镇压机制与上一节记录的更严厉的镇压形式之间有关联，包括任意拘留知名民间社会领导人。如之前报告所述，“强硬”和“较温和”的机制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压制、阻止和镇压反政府声音的国家政策。整体而言，这些侵犯人权行为造成了一种长期的控制、警惕和恐惧氛围，限制了公民和民主空间的稳健发展，使民间社会和政治行为体无法在不受政府监督或胁迫的情况下行事。

五. 战略和战术行动局

83. 除了调查用于限制公民和民主空间的镇压机制外，调查团还继续调查参与严重侵犯人权和危害人类罪行为的机构。调查团在第一次报告中指出，玻利瓦尔国家警察特别行动部队是其中之一，特别是在打击犯罪的安全行动中实施这种罪行。

84. 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尽管特别行动部队看似已于 2022 年解散，但是 2022 年 7 月成立的战略和战术行动局是它的延续。这两个机构的职能相似，工作方式也相同。此外，特别行动部队的许多官员目前在战略和战术行动局指挥系统中担任关键职位，已经确定其中一些人曾参与严重侵犯人权甚至危害人类罪的行为。

A. 前身：特别行动部队

85. 调查团在 2020 年的第一次报告中，将特别行动部队确定为最常参与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甚至危害人类罪的执法机构之一，作为打击犯罪的更广泛国家政策的

³¹ 见人权高专办，“委内瑞拉：非政府组织法草案出台，公民空间的关闭已经无可挽回”，2023 年 1 月 30 日。

一部分，包括通过法外处决消灭被视为“罪犯”的个人。³² 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玻利瓦尔国家警察和特别行动部队对 2019 年记录的杀戮事件中 64.5% 的事件负有责任。³³ 调查团还记录了他们参与任意拘留实际的或以为的政府反对派，随后将其移交国家情报部门，使其遭受酷刑。调查团建议该国解散特别行动部队，因为该部队自成立以来实施了大量法外处决。³⁴

86. 自 2020 年 12 月起，对特别行动部队进行了逐步改组。尽管如此，2022 年 4 月和 5 月，它参加了雷霆行动(*Trueno*)，这是一系列旨在摧毁犯罪组织的新安全行动。

87. 两个月后，即 2022 年 7 月，特别行动部队显然已被解散。调查团于 2023 年 3 月报告说，根据它掌握的资料，虽然特别行动部队已正式解散，但其主要职能、指挥官和成员已由战略和战术行动局接管，战略和战术行动局是玻利瓦尔国家警察局的一部分。³⁵

B. 结构和指挥

88. 2021 年 4 月 13 日，总统通过第 4582 号法令下令改组玻利瓦尔国家警察局。³⁶ 在改组的一年限期过去之后，没有公布任何正式资料，说明改组结果或在警察局内部建立了哪些新机构。直到 2022 年 7 月 27 日，在战略和战术行动局成立之际，玻利瓦尔国家警察总指挥官才宣布，该局将由现有的 10 个“立即行动”特别部门组成，以集中管理所有特别行动。³⁷

89. 调查团获得了玻利瓦尔国家警察局的内部组织结构图，其中详述了该机构截至 2023 年 2 月的结构。战略和战术行动局似乎是直接向玻利瓦尔国家警察分局汇报的九个“战术”局之一。调查团的调查证实，新的战略和战术行动局接管了 10 个立即行动特别部门的指挥权，这些部门以前受玻利瓦尔国家警察总指挥官监督，具有多种职能，包括情报、调查、反恐和打击有组织犯罪，这表明该局负责的不仅仅是战术行动。一名了解玻利瓦尔国家警察内部信息的提供消息者告诉调查团，战略和战术行动局局长比玻利瓦尔国家警察总指挥官本人拥有更大的决策权。

90. 调查团确定了至少在 2023 年 6 月 5 日之前在该局担任领导职务的 14 名个人，全部为男性。这些人中至少有九人曾是特别行动部队和其他国家安全部队成员，包括玻利瓦尔国家情报局成员，他们参与了调查团在之前报告中记录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和犯罪行为。

³² A/HRC/45/33，第 102-119 段。

³³ 同上，第 105 段。

³⁴ 载有调查团详细调查结果的会议室文件(第一次报告)，建议，第 48 段。

³⁵ 调查团向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口头介绍的最新情况，2023 年 3 月 22 日。见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ffmv/index>。

³⁶ *Official Gazette*, No. 42,105, 13 April 2021.

³⁷ *Venezolana de Televisión*, “Inauguran Dirección de Acciones Estratégicas y Tácticas de la Policía Nacional Bolivariana”, 27 July 2022 (只有西班牙文)。

91. 正如调查团之前所记录的，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以下个人参与了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和危害人类罪：José Miguel Domínguez Ramírez (别名“Miguelito”)，2022 年 7 月 27 日至 2023 年 7 月 18 日担任战略和战术行动局局长；Carlos Alberto Calderón Chirinos，战略和战术行动局现任局长和前副局长；以及 Ronny González Montesinos，战略和战术行动局刑事调查司司长。这些人非但没有因据称对这些罪行和侵权行为负有责任而受到调查，反而被政府嘉奖甚至晋升。以 Domínguez Ramírez 先生为例，根据调查团掌握的 latest 资料，他在战略和战术行动局担任完局长之后，于 2023 年 7 月被任命为玻利瓦尔国家警察局副局长。

C. 工作方式

92. 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战略和战术行动局各单位和官员的工作方式与特别行动部队以往开展安全行动的方式如出一辙。可以从警察部门的行动中看出这种延续性，这些警察部门后来在 2020 年底至 2022 年 7 月的过渡时期成为战略和战术行动局的一部分。

93. 调查团收到的资料表明，2022 年 5 月至 9 月期间，战略和战术行动局参与了在阿拉瓜州、亚拉奎州、瓜里科州、米兰达州和安索阿特吉州等五个州开展的“雷霆行动”，这次行动导致 72 人死亡，至少 345 人被捕。调查团咨询的消息来源表明，“雷霆行动”包括联合或混合行动，由文职官员和军方联合指挥，大规模涉及不同安全部队的参与。该局自 2022 年 7 月成立以来，参与了最近五次行动。

94. 虽然“雷霆行动”的官方目标是摧毁犯罪集团，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杀害或被捕者的亲属坚称自己的亲人与这些集团没有关系。³⁸ 这些行动并没有导致所谓目标团伙的任何头目被拘留或死亡。2022 年 9 月 28 日在米兰达州的“雷霆七号行动”中被杀害和被拘留者的亲属报告说，主管机关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并实施任意拘留和法外处决，他们指出被杀害者没有与安全部队“对抗”，却被当场处决。³⁹

95. 战略和战术行动局的干预方法和“雷霆行动”的总体特点与特别行动部队或人民解放行动和人民人道解放行动的干预方法和特点并无本质区别。⁴⁰ 调查团在第一次报告中得出结论认为，这些行动是国家打击犯罪政策的一部分，包括通过法外处决消灭被视为“罪犯”的个人。⁴¹

96. 调查团之前调查了特别行动部队与军事反情报总局和玻利瓦尔国家情报局在有针对性地镇压实际的或以为的政府反对派方面的合作，包括任意拘留和将被拘留者移交情报部门，由情报部门官员对他们进行审讯和实施酷刑。调查团收集的证据表明，在从特别行动部队过渡到战略和战术行动局的过程中，目前在级别上隶属于战略和战术行动局的各司，如刑事调查司和战略情报司的官员继续任意拘留实际的或以为的反对派，将其移交情报部门。调查团还有合理理由相信，战略

³⁸ Runrun.es, “Operaciones Trueno: las OLP de 2022”, 31 December 2022 (只有西班牙文)。

³⁹ Lupa por la Vida, “Operaciones Trueno letales”, 23 November 2022 (只有西班牙文)。

⁴⁰ A/HRC/45/33, 第 83-101 段。

⁴¹ 同上，第 160 段。

和战术行动局参与了 2023 年 8 月 21 日对工会领导人 José Antonio Cádiz Morales 的任意拘留，作为对他参与工人抗议活动的一种惩罚，同时为了获取有关其他工会和政治领导人的信息，对他实施了酷刑。

六. 参与侵权和犯罪行为的机构

97. 调查团的调查表明，国家机构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帮助镇压实际的或以为的政府反对派。其中一些机构，包括监察员办公室和全国选举委员会的任务对于维护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公民和民主空间而言至关重要，而它们却未能履行这些任务。国家对这些机构作为国家代理人的作为和不作为造成的侵犯人权行为负有国际责任。

98. 调查团详细调查了监察员办公室的作用。2016 年，国家人权机构全球联盟对监察员办公室缺乏独立性和没有对政府滥用职权现象作出反应感到关切，将其评级从 A 级降为 B 级。调查团的调查证实，这些令人关切的问题仍然存在。现任监察员 Alfredo Ruiz Angulo 公开站在政府一边，在面对该国人权危机的重大事件时，他违背了宪法任务，没有发表意见。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监察员办公室经常故意不对严重侵犯人权的指称作出有效回应，既没有依职权行事，也没有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申诉作出回应。

99. 调查团还调查了全国选举委员会的作用，该宪制机构的任务是监督公职选举以及工会和其他公益组织的内部选举。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全国选举委员会的多数成员是亲政府派，缺乏履行宪法职责所必需的独立性，而且受到国家其他部门的不当影响。根据本报告所记录的案件，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全国选举委员会实施的规范和做法任意限制了反对党的成立和自主运作，削弱了公众对选举制度的信任，并限制了工会的活动。

100. 另外还有两个机构在限制委内瑞拉的公民和民主空间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国家电信委员会任意利用行政程序，限制对政府持批评立场的媒体平台。第二，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主审计长违反国际标准和适用的国内程序，有选择地取消反对派领导人的政治资格。

101. 调查团的调查继续显示，国家安全部队和情报部门在有针对性的镇压活动中犯下了严重侵犯人权和犯罪行为。在调查团本报告所述期间记录的 124 起任意剥夺生命、任意拘留、短期强迫失踪、酷刑和虐待以及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案件中，军事反情报总局参与了 40%，其次是玻利瓦尔国家警察局(35%)和玻利瓦尔国家情报局(15%)。这三个机构对调查团记录的 81%的任意拘留案件和 93%的酷刑案件负有责任。包括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以及科学、刑事和法医调查股在内的其他安全部队参与了调查团调查的主要侵犯人权行为。

七. 结论和建议

A. 结论

102. 在本报告中，调查团将调查和分析重点放在自 2020 年 1 月 1 日以来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和罪行。调查团的重点仅限于根据

国家政策实施的侵权行为，正如调查团第一次报告所述，这项国家政策是为了压制、阻止和镇压反对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政府的人。⁴²

103. 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调查团在本报告第三节记录的一些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特别是在 2020 年至 2021 年初期间实施的一些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是调查团之前查明的攻击平民行为的一部分，在这方面，属于之前被调查团定性为危害人类罪的同一行为过程的一部分。⁴³ 这些侵权行为包括任意拘留、酷刑和性暴力，包括在应对所谓的叛乱(如“吉迪恩行动”和“宪法行动”)时实施的行为。

104. 关于 2021 年初之后的时期，调查团收到的关于针对实际的或以为的政府反对派实施任意剥夺生命、短期强迫失踪、任意拘留、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以及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指称有所减少。尽管如此，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2021 年初之后实施的一些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涉及与调查团之前确定为危害人类罪的行为有一些相同要素，包括作案手法、国家安全部队据称参与犯罪，以及受害者的特征大致相同，尽管最近一段时间对目标受害者的选择更加谨慎。

105. 调查团无法就这些行为的关键特征得出结论，因此无法将这些行为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七条所指的国家政策联系起来。关键特征涉及国家机构在此期间的运作方式、决策过程、命令的发出和接收以及其他沟通和报告渠道。至于调查团收到的针对某些罪行的指称数量有所减少，对有关行为是否构成《罗马规约》第七条所指广泛或系统性攻击的一部分有何影响，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调查才能得出结论。

106. 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本报告第四节所述的其他镇压机制助长了用于压制、阻止和镇压实际的或以为的政府反对派的国家政策。自 2020 年 1 月 1 日以来，包括安全部队和其他公共实体，如监察员办公室、国家选举委员会、总审计长办公室和国家电信委员会在内的国家主管机关的作为和不作为，助长了对该国公民和民主空间的严重限制。

107. 调查团通过调查了解到，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对实际的或以为的政府反对派采取了“强硬”和“较温和”的镇压策略，这两种策略是镇压性国家机器的两个组成部分，根据社会异议的性质和推断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加以使用。在 2014 年至 2019 年委内瑞拉街头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的早期阶段，国家积极地使用更为暴力的“强硬”策略，不惜一切代价镇压反对派的声音，包括通过实施犯罪。虽然国家之前就曾使用过“较温和”的胁迫手段，但近年来变得更加突出。

108. 国家在使用镇压机器时变得更有选择性，一部分是因为之前对不同政见的镇压产生了寒蝉效应，国际社会对以往侵权行为进行了审查，以及许多人有充分理由担心因政治原因遭受迫害而逃离该国。而且，一旦众所周知国家以往有暴力镇压的记录，使用较温和的胁迫手段就能造成潜在威胁。然而，调查团的调查表

⁴² 同上。

⁴³ 调查团在第一次报告中记录了它有合理理由认为构成危害人类罪的案件，包括截至 2020 年 8 月的案件(A/HRC/45/33, 第 161 段)。2020 年和 2021 年初犯下的其他危害人类罪案件也是调查团第二次和第三次报告的主题(A/HRC/48/69, 第 69 段和 A/HRC/51/43, 第 9 段和第 45-50 段)。

明，如果出现主管机关认为有必要使用强硬策略的情况，国家仍然有能力这样做，作为压制异己的手段，而且主管机关能够随意启用或停用这种策略。因此，必须继续将真正和有效的正义和追责作为衡量委内瑞拉人权状况的准绳，国际社会必须继续监督该国的人权状况。

B. 建议

109. 调查团重申先前向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提出的建议，并从本报告附带的两份会议室文件所载较长建议清单中着重指出以下建议：

(a) 对包括本报告和所附会议室文件在内的调查团报告中记录的所有侵权和犯罪行为进行迅速、有效、彻底、独立、公正和透明的调查；

(b) 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恐怖主义特别法庭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c) 立即对提交法院的酷刑、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指控采取行动，并对调查团当前报告和以往报告中记录的所有案件进行审查，以适当调查这些指控，并确保幸存者能够获得全面援助和赔偿；

(d) 确保全体人民的表达自由、意见自由、结社自由、和平集会自由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自由得到尊重和保护；确保人权维护者(包括土著领导人和环保活动人士)、人道主义工作者、记者、政治反对派和工会成员能够在安全的条件下开展活动，不受骚扰、威胁、恐吓、监视和报复；

(e) 废除用于压制民间社会合法活动和对实际的或以为的政府反对派进行定罪的法律，或暂停法律草案的立法进程，包括《反对仇恨、促进和平共处和容忍的宪制法案》和关于非政府组织和有关组织的管制、正规化、运作和筹资的法律草案；

(f) 避免利用其他法律，例如《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资助恐怖主义法》以及《刑法典》中有关恐怖主义、诽谤和侮辱的条款，将人权维护者、记者和政治反对派定罪；

(g) 确保调查战略和战术行动局官员在侵犯人权和实施犯罪方面发挥的作用，如调查团在之前报告中所记录的情况；

(h) 改革战略和战术行动局及其各司，包括高级和中级管理层，并建立一个独立监督机制，以确保切实、有效和持续地改变其做法。
